

文学政治维度缺失的时代症候^{〔*〕}

○ 胡友笋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新时期以来在文学“回归自身”的过程中,文学的感性人学解读倾向和“审美自治论”的高扬,不仅将文学与政治截然对立起来,进而阻隔了言说和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逻辑进路;而且还在文学实践上造成了“纯文学”的迷思以及极端个体主义和感性主义的文学身体表演。面对显而易见的当下窘况,文学更应以其独特的公共关怀品性为基础,去触及时代精神或最根本的核心问题,使文学超越“个人”而获得更为深远的价值与意义。本文通过对“身体写作”、“纯文学”诸观念及文学实践的分析 and 批评,反思文学“去政治化”的偏狭和虚妄,以之说明当下重构文学政治维度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学;身体写作;纯文学;政治维度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事实上,不仅文学实践,文学理论亦如此,每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基本上也是由这个时代的文学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的。就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言,之所以重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除却澄清二者关系认知的历史疑虑与理论分析之所需外,也是由于当下文学实践所暴露出的问题和时代发展要求向我们提出了这一课题。一方面,当下的文艺学界正在流行一种共识,即将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特定历史时期概括和视作为文学对人的漠视,这似乎成了盖棺定论那个“极左”时代文学发展

作者简介:胡友笋(1979—),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ZD00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J17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史的时髦话语;另一方面,当下的文学写作正假“文学是人学”之名,以“主体性”为矛,以“自足性”为盾,在“感性写作”的隐私暴露与“身体写作”的欲望叙事共同织就的感性狂欢中,进行着所谓“去政治化”的“大逃亡”和“回归自身”的“革命”。而与此同时,不仅一般的文学读者对当下这一文学现状有诸多不满(譬如指责“身体写作”有贩卖情色的嫌疑),而且文论研究者对此也深感失望(譬如批评者对“纯文学”的质疑)。造成此不满与失望之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很大程度上也与新时期以来以割裂文学与社会政治关联为要务的“回归文学自身”的迷思密切相关。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疏理一下文学政治维度逐渐缺失的脉络轨迹,以之说明何以需要以及如何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

一、文学的“具身化”及政治虚无主义

新时期之初“拨乱反正”中的“文学是人学”解读,以人道主义精神高扬人的主体性和个性,把文学从服务政治的“工具论”中解放出来,使文学回归到“写人”、“写人的全部生命需求”。^[1]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新时期“解救”文学过程中的“文学是人学”阐释,更多地关于文学的人学性论述重心和注意力集中在个体之感性、主体性、现实存在性上,搁置了对人的社会性、政治性、生成性一面的阐释。这之于当时自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有意或无意的阐释盲点,不仅直接影响了文学与政治关系命题的理论研究,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实践。当下文学实践的一个严重误区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的、政治的“人”在文学中不断疏离。今天的文学创作者虽然也高度认同“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念,但其所说的“人”主要是感性的人、以“身体存在”的人、“与世隔绝和离群索居”的人,那些所谓的“写人”的文学,所谓自由抒发个人“真实”感受的“私人文学”、“身体文学”,所写的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而是他们用“身体”来表征存在且认为也只能用“身体”才能确证存在的弗洛伊德所言的“本我”的人。其结果是留给人们关于当下文坛的整体印象,即使并非像一些批评者所指认的“欲望凸显,性爱独步”^[2]那样夸张,但是“女性用身体独白,男性用下半身狂欢”确也使得“本能”与“身体”成为当下文学的两个关键词”。^[3]诸多以“尖叫”、“性感”、“欲望”表征“身体存在”的“人”,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轮番登台“走秀”,而文学对社会的关注,对精神的守望,对当前热议的公共空间和理想政治图景的想象和超越等等,则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急剧退场,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文学精神“就这样从原来的总是质询时代的政治性主题和群体意识,转变为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探索,从集体的人指向了个体的人,人被从当下政治和种种社会环境制约下的现实的人转变为一种抽象的甚至摹拟的人”。^[4]

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说与新时期在“文学是人学”解读上过于强调人的个性和感性形态而搁置、摒弃人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有着内在的关联。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已经深刻地批判了那种费尔巴哈式感性唯物主义对“人”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但是今天的“私人化”和“身体化”写作者却刻意并执着地从

感性直观的角度来理解人、把握人、表现人,过度张扬人的自然人性,肆意渲染人的感官刺激,“把人导入低级的感性生活和纯直觉的无意识活动”。^[5]一些“写身体”和“以身体写作”的作家宣言:“身体的欲望总是更能接近人的本质意识”——不仅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居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理想、追求、民主、自由”等等“积极向上的东西”,“我的性里都有”。^[6]在他们看来,之前的“我们”是太过于关注和推崇“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结果导致“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而救赎之路就在于“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7]

虽然,我们承认对“人”的感性现实和身体的发掘与描写,“发现了被以往所遮蔽的新视野”,^[8]但这种发现和文学表现也是“症候式”的,其对人的个性和感性形态的过分强调,对人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的漠视和逃避,对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关怀的自我放逐,不仅造成文学创作者的“作茧自缚”,把文学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呈现、身体的表演、私秘的暴露、欲望的尖叫,“关于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书”;^[9]而且这种文学发现和表演,作为“整个社会与知识界去政治化、去组织化、去历史化的一部分”,只能使“人们更关注私人空间、‘个人’与当下”。^[10]尽管有人将其美其名曰“身体解放”,但不无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只看到了消费主义背景中性展示的轻佻和身体裸露的疯狂。这种“身体写作”与其说是以所谓的“身体解放”颠覆政治约律的“回归自身”的运动——“在颓废的情绪中潜藏着坚韧的自尊,在‘性爱’背后蕴含着对孤独意识的呼唤,在苦涩灵魂里隐闪着人生真谛的生命本质”,^[11]不如说更多表露的是弗洛伊德所言的“欲望是一口沸腾的大锅”式的本我放纵,所谓的颠覆性之说或许“不过是妄图博取名利的作家和为之胡乱吹捧的评论家们制造出来乱人耳目的合法性神话而已”。^[12]

概言之,如果说之前的文学主张由于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而轻视和忽略了人的感性属性,是“反人性”的;那么,今天只强调和认可人的自然属性的矫枉过正同样也是危险的。通过“发掘”人的感性身体来对抗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存在,通过展示人的感性欲望来嘲弄人的理想价值诉求,不可能是什么意义上的真正写作,其结果不仅无法真正实现文学的“人学回归”,而且还造成了文学的人学价值不断空洞化、虚无化。尤其是以“身体觉醒”和“性启蒙”的名义消解人的政治约律和审美理想,不仅无法捍卫文学的存在基石,还将制造新的价值倾斜。我们更不可能奢望在这样的身体之“觉醒”和“启蒙”中走向“人的全面解放”。

二、“纯文学”的迷思与公共品性阙如

如果我们沿着“私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问题回溯,还将进一步发现,当

前文学的这一症候其实与新时期以来所提倡的“纯文学”观念密切相关。文学公共关怀品性的消失,既不能完全归咎于市场,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政治,而是肇端于持论者所信奉的文学“自足”的神话。

当代语境中的“纯文学”是与文学“去政治化”联系在一起的。新时期之初提出此概念命题,其社会背景和理论指向之一即在于以此反驳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主义弊端和工具论观念。所以,“纯文学”的概念在新时期之初一出场就表现出“非政治”的诉求特性,所谓的“自足性”、“文学性”、“审美自律性”等“纯文学”知识谱系无不有为“去政治”的文学建构合法性理论依据的意图。考虑到此前文学惨遭“极左”政治“蹂躏”的历史,“纯文学”这一观念所蕴藉的对阶级政治僵硬规约文学的不满甚至恐慌情绪自是明显。但问题是,这一同样具有政治化情绪(一些评论者称之为“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文学主张对此后的文学实践所带来的影响则是异常深远的,“它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已改写了中国的当代文学”。^[13]

“纯文学”观念的这种“影响”和“改写”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再评价上,以作品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有无和关联程度作为评判文学高下优劣的最高标准或唯一标准。“纯文学”持论者坚称文学就是“文学本身”,文学既不需要也不应介入社会和政治,并以“纯文学”为旗帜“重写文学史”。在此理论大纛下,鲁迅、矛盾等左翼作家因与政治“靠得太近”而被降低甚至否定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张爱玲、周作人等“自由主义作家”则因其“远离政治”的创作和生活情状得到“近乎病态的鼓吹”(李国文语)——“站在纯文学的角度上,一万个周树人也比不上一个周作人……当一个人把文学当成武器,那你就永远与文学无缘,周树人本质上与文学无关,只不过是一个文字的传声筒而已,文学自有文学的境界”。^[14]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与“改写”集中表现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逐渐与政治及社会公共生活无关。而且,这一点更为突出。按照那些自称或被称为“纯文学”写作者的话说,文学作品若要配得上“纯文学”这一神圣称号,写作者就要“不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他们的目光总是看到人类视界的极限处,然后从那里开始无限止地深入。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地击败常规‘现实’向着虚无突进,对于那谜一般的永恒,他们永远抱着一种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表层的记忆是他们要排除的,社会功利更不是他们的出发点,就连对于文学的基本要素——读者,他们也抱着一种矛盾态度。自始至终,他们寻找着那种不变的、基本的东西,为着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15]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就在这种“向着虚无突进”、不为社会功利而“为着人性完善默默努力”的行进和表演中,“不再介入人民的经验世界,也不再介入人民的精神世界,它远远地独自跑开了,它成了不介入的文学”。^[16]

无论是早期“先锋文学”的形式试验,还是后来出现并在当下流行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情状在于文学与社会、与现实、与公共

生活越来越隔膜。不仅写作者而且理论批评者也深陷在“纯文学”空心化、抽象化的“纯粹”观念里,割断文学与社会的丰厚血脉联系,拒绝文学对社会现实和公共政治生活的关注和发声。空心化、抽象化的文学文本,不仅因与宏大社会内容无关而沦为单纯的炫技、形式的猎奇、语言的游戏,而且也因作家视野狭窄致使所写内容仅局限于个人感性经验而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这不仅与“文学是人学”的本质相悖,而且也使文学丧失了展现社会现实生活整体性的能力和追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动力。我们今天再来看待这一文学观念,虽然其在阶级政治直接影响文学的时代有助于文学的“自我救赎”,对抵制消费主义时代的商业化侵袭也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人为割裂文学与社会的关联,拒绝文学的公共关怀,迷恋自我的“纯粹”,致使自己徘徊在巨大社会现实和公共政治生活之外,“与时代现实人心越来越远,成为读者身外的‘冷风景’”。^[17]

事实上,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8]文学不可能是无人的概念和理论构想,它开始于人的具体社会与历史处境,“是思想者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19]“不管我们怎样缩小现实的意义或者强调艺术家所具有的改造或创造的能力,文学避免不了同现实打交道。”^[20]若我们一味地片面追求文学的“纯粹”自足性,似乎可在表面上维持文学的自律性,实则易使文学的人学主体性遭到根本性颠覆和否定。若此,则不仅与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传统相背离,而且也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上表现出的积极诉求公共价值的努力相去甚远。如果我们能够审慎辨析新时期“纯文学”概念提出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则不难发现这一强调“自足”的文学观念既有对自身的虚幻错觉,也有对“政治”的认识错觉。而对错觉的纠正,则正是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支点。尤其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文学更应以其独特的公共关怀品性为基础,去触及时代精神或最根本的核心问题,使文学超越“个人”而获得更为深远的价值与意义。

三、应重新梳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马克思说:“理论是时代问题的回声。”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共识已达”之理论幻象与当前文学实践陷入“巨大混乱”的纷呈乱像,大有托尔斯泰所批评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良心不一致”的症状,我们在理论上为文学“去政治化”所寻找到的那些“合法”和“正当”共识,在显而易见的文学实践窘况面前多少显得黯然失色。这似乎提示我们需要审慎反思:我们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所达成的“去政治化”共识是否也存在某种认识的偏见?那种壮士断腕般的“为文学正名”是否也有买椟还珠式的自我反省的浅表性?^[21]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是否需要重建文学的公共政治维度?在此,彭亚非有关身体写作的批评言论或许对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究竟该如何抉择更有警示和启发意义:“无论如何,道德的彻底堕落和信仰的完全放弃终究是不可取的。即使是陈旧的假

面具和欺世谎言已经被后现代的解构全部毁弃,新的文明信念和人文崇尚也必须全面地建立起来。一个人或者一个女作者没有尊严意识是他自己的事,但是整个民族都不再具有尊严意识,则将是一件极其可怕、可悲和可耻的事情。就此而言,我们决不应听任文学的责任与良知在今天的文学理念中让价值虚无主义的意识所彻底排挤和遮蔽,精神的关怀与救治即使在现实中已成镜花水月,在文学的写作中也不该被人性的沉沦所完全取代。”^[22]

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言说,将社会政治看作是文学得以甚或必须表现的内容和背景,使文学在“从属”和“服务”政治的关系向度中沦为缺失自主性的“附庸”。新时期以来,在文艺学界“去政治化”的“拨乱反正”之“共识”影响下,文学又逐渐与政治渐行渐远,成为远离时代人心的“冷风景”。这种“非此而即彼”的关系判定,当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来有自,并打上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曲折演进历史的深刻烙印。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当文学理论已进入一个较为常态的生存环境时,有关这一命题的应有理论省视却未被重视,甚至这一命题本身也被悬置起来。这并非是因为我们已在此命题上取得了根本性的思想成果,究其根源,实乃是在今天的文学磁场里依然存在着的“非此即彼”固见左右了我们的视线。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深受二元对立认识范式的影响,把人的个性和社会性、人的现实性和生成性截然对立起来,进而遮蔽了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多维存在向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界在反思“极左”政治时,并未对政治概念本身进行有效反思和建构,反而沿着二元对立的思路以对政治的回避来实现和证明“纯文学”的自足自律。这尽管瓦解了政治中心论,实现了文学由公众聚焦的中心走向边缘的“自身回归”,但“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自治”诉求也使文学画地为牢,成为无关社会存在和价值诉求的观念性、虚幻性文学。客观地讲,这种割裂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联,放逐和摒弃政治在文学中的存在的认知倾向,不仅否定了“政治”所内蕴的丰赡人学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以极端态度鼓吹边缘撤退或者全面缺席,在某种程度上与强制合谋的“极左”政治一样,有再造“无政治”文学的危机。

换言之,我们所反对和纠正的应当是对本来正确的东西的某种偏狭或错误解释,而不是因为对这个正确东西的错误解释反而遗弃这个本来是正确的东西本身。僵化的“从属论”和“服务论”固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决绝的“去政治化”同样也是虚妄的。就此而言,章学诚在批评宋儒时所用的形象比喻,或许对我们如何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他在批评宋儒“欲使人舍器而言道”时说到:“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叫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23]这也正如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应该对此抱“扬弃”的态度,而不是简单“抛弃”,不应在“倒洗澡水时将孩子也一并倒掉”。

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命题的认识上,更为确当的乃是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确立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即摒弃在文学认识上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因为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政治场域、社会场域乃至经济场域对文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中;而依据内部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宽泛地指责文学对社会政治的积极介入将影响其艺术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政治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我们之所以将实践存在论和关系主义视角引入这一理论命题,实乃试图通过对政治概念的反思和对文学感性人学解读的批判,揭示长期以来在文艺与政治关系认识上的二元对立遮蔽,以将文学应当如何作用于人的社会政治实践这个重大问题开放出来。因为“极左”政治被解构之后,确实还存在一个重构和创建正确的、健康的、适合于引领文艺发展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学与政治新关系的问题。

注释:

- [1] 朱立元:《“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永远不会过时》,《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1月17日。
- [2] 王洪岳:《当代文学中的欲望叙事与犬儒主义》,《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 [3] 朱首献:《文学的人学维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 [4] [17] 雷达:《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精神》,《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 [5] 董学文:《人性深度与艺的价值取向》,《求是》2008年第10期。
- [6] 朱文:《我爱美元》,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
- [7] 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杨克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第544-547页。
- [8] 张光芒:《欲望叙事的溃败:从“个体写作”到“身体写作”》,《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 [9] 韩少功:《灵魂的声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0] 李云雷:《小说如何切入社会》,《朔方》2009年第9期。
- [11] 朱德发:《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9页。
- [12] 黄应全:《解构“身体写作”的女权主义颠覆神话》,《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
- [13] 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 [14]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16194.shtml>
- [15] 《究竟什么是纯文学》,《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 [16] 葛红兵:《介入: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信念》,《上海文学》2001年第4期。
- [17]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1页。
- [18] 徐贲:《文学的公共性与作家的社会行动》,《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 [19] 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 [20] 胡友笋:《从立场到方法:文艺与政治关系研究的困境和出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 [21] 彭亚非:《“身体写作”质疑》,《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
- [22]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责任编辑:黎虹]